



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



国风◎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

◎ 国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 / 国风著.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058 - 5523 - 9

I. 中… II. 国… III. 农业 - 源流 - 研究 - 中国 IV. 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5329 号

责任编辑: 吕亚亮
责任校对: 王肖楠
技术编辑: 李长建
封面题字: 王定成
整体设计: 蒋宏工作室

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

国 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第三编辑中心电话: 8819130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bj3@esp.com.cn

北京密兴印刷厂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1.25 印张 130000 字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 - 5058 - 5523 - 9 / F · 4782 定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农耕”与中华文明

在时下的语境中，一谈到“三农”，大多数人会想到“三农问题”，甚至还会想到“滞后”、“现代化障碍”等等。其缘由不外乎两点：浸淫于现代化带来的幸福生活的人们正自觉不自觉地渐渐淡忘了现代文明的源头——农业文明，而现代我国农村的贫苦和落后，又使得温馨的乡村只在古诗中才能觅得，“贫困”、“落后”几个孤独的名词就成了人们对“农”的主要印象；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冲击着国人眼球，甚至生活。

我亦如此，在刚听说国风有关于“三农”新作时，充盈和盘桓在我脑际的就是“三农问题”，为此，我在拜读前做好了“苦读”的心理准备。出乎意料，整个阅读的过程是想象不到的轻松愉快，我几乎是以废寝忘食的方式读完。整个书稿给我的不仅仅是视角的冲击，更重要的则是内心的强烈震撼。作者高屋建瓴，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古代聚落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伦理道德的逐步规范化等文化的全新视角，引经据典给我们诠释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内在联系。透过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先祖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国风治学谨严，勤于思考，数十载耕耘不止，每著独辟蹊径，必有独到见地，往往给读者以惊喜。《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和《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三部力作是他多年广涉中外史书，研究史料之心血。其突出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地运用现有的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将历史与现实辨证地结合在一起，从农村、农民、农业三位一体的视角，清晰地再现了自上古时代起，我们的先祖们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所做的艰辛劳作和取得巨大成就的恢弘历史，揭示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渊源关系

通常我们所看到研究中国文明史的论著，或以通史或以专门史的方式展开。而研究“三农”者大多带有明显的专题性。从农村、农民、农业三位一体的视角，把远古的“三农”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结合在一起而进行研究的论著仍属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风新著的命题就已经是一种创新。而在书中，这样的创新亦随处可见。作者在论证文明的起源时说：“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又发生大转折。对外，农庄聚落间的交往越频繁，战争越剧烈，集团意识更加强；同时由于战争掠夺，内部贫富的差距也益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野益明。军队、政府于是产生，这就是国家。他们在聚落周围圈起城墙，保护自己，抗御敌人，考古学家把这种转变称为‘城市革命’。人类文明史上‘城市革命’的意义或不及‘新石器革命’之深远，但也不失为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不比工业革命逊色。而今后人类才有典章制度、文字艺术。”据此，得出结论：“历史文明肇端于此，荫庇后世无穷，我们今日尤承受其遗泽。”作者在论证“三农”对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和先祖对后人启迪时，作者



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分别在我国土地上开天辟地，创造文明。他们先聚集为村落，然后又聚集成国家。物质文明虽然精进，但食稻粟，住木土，发端于数千年前，而成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远古农庄聚落阶段的‘均’于‘公’，从现实升为理念，启发两千年后的（老子）和‘礼运’。4000多年后也启发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它变成中国文化不竭之源泉，人类文明永恒的瑰宝。中外历史也显示人类不断地朝着‘均’与‘公’的道路上迈进。”回首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吗？

著述始终以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严谨论述方式，使这一创新更趋完善。据我的粗略统计，在论述中因为考据的需要，三部著述中，仅提到的历史人物就逾百位，引用的史籍过百部。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把所需要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并科学地运用，实非易事。阅读梳理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几十年耕耘的基础，的确无法想象。国风所著真正做到方家所云的“论从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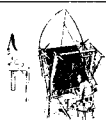
第二，从中西文化的交流入手，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阐释了人类历史的持续进步，离不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基本思想，使其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逐步趋于系统

“三农”从诸多方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再次作了阐释。以佛教为例，佛教的传人对中国丧礼形成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民间丧礼传统的影响和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起了特殊的作用。在佛教传入前，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仪式繁杂的丧礼。其特点是，“‘灵魂不死’的观

念，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绕在中国的丧礼中”，但“‘灵魂不死’的观念在死后的信仰中是不完善的，对灵魂的去处，并未形成合理的宗教逻辑”。因此，“未来的佛教，却带来一套新的死后世界观——六道轮回，转世托生。”此后，虽然佛教有灵魂的理论曾经遭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抗诘，甚至在梁武帝时发生了著名的儒佛论战。但“相当于儒家《孝经》的佛教经典《反母恩重经典》，显示了佛教与儒家在孝亲观念上的协调”。“佛教进入中国时，也还带来了佛教特有的丧礼仪式。”而“最能代表佛家仪式的便是丧礼中的（七七斋）”。作者得出结论是：“丧乱仪式的三教融混，与死后信仰的三教归一，是同时并进的，而且愈来愈普及，普及的过程是由社会下层渐及上层。”这些观点，使作者在不同论著中提出的比较零散而具有创新意义观点逐渐趋于系统。

第三，作者由古而今、从宏观到微观、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述”必有据、“作”而新颖、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拘泥于成说的思辨和表述方式，不仅使其新著给读者以深刻的哲学启迪，同时也具备了明显的可读性

国风的三部新作，采用的是分小题独立成篇的体例，每个小题之间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作者由古而今、从宏观到微观、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述”必有据、“作”而新颖、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拘泥于成说的思辨和表述方式的一致性。应该承认，作者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表述方式是一大特点。说学术性强，是因为他在阐述每个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代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观点的重要史籍相互印证，极其严谨。从而能够做到对某一事件、制度、节庆的起





源与演变的历史脉络交代的十分清晰。说通俗，是因为作者并不是照搬古人，而是把那些对一般读者来说比较隐晦难懂的话变成今人容易理解的生动活泼语言表达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非是述而不作。相反，论著中有诸多作者自己极富创新的观点。比如，在《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中他提出：“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生产工具虽然没有大改进，社会、文化也会发生大变革……”可见社会转型和文化缔造，因素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归之于生产工具。”再比如，在《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中，他提出：“再进一步看，任何新开拓的疆土，也只有在农业生根之后，中国文化才可能在其上成长茁壮。……因此，农业疆域的扩展实际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扩展。”诸如此类的新观点还有很多。这些观点不仅符合历史，在当今中国也有一定现实意义。比如，作者所说的“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我认为，这一观点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像以往一样，把登上一座山峰，截住一条河流、建成一坐水电站，看成是“征服”了山河的英雄壮举而加以炫耀，不仅幼稚而且把人置于自然之外，有悖自然规律。

给广大读者推荐国风三部新著的原因，是因为在我通读书稿时给予我的重要启迪和精神享受！

是为序。

魏晓东谨识

丙戌年端午节于万寿寺甲4号

目 录

1	农业的自然环境	1
2	各历史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概况	5
3	自然环境影响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7
4	自然环境对人口成长的影响	11
5	气候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5
6	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19
7	黄河流域农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22
8	黄河流域降雨的特点	26
9	气候转变对黄河流域农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28
10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	30
11	古代农业水利的发展与成就	33
12	春秋战国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的兴起	34
13	西汉时期北方渠水事业的开发	38
14	汉代渠水事业经营的特点	44
15	东汉时期淮河流域陂水事业的发展	46
16	东汉对黄河流域渠水事业的维护	50
17	三国屯田制度下的渠陂事业经营	52
18	两晋南北朝水利事业的变化	57
19	耕地的开发	64
20	农业技术的发展	66
21	汉末以后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70
22	南方农业的发展	74



- 23 人口南迁对耕地的需求 77
- 24 耕作技术的发展 80
- 25 明代以后南方新耕地的开发 84
- 26 近代边疆的垦拓 88
- 27 东北的开发 91
- 28 台湾的开发 94
- 29 边疆开发的意义 99
- 30 土地分配与经营 101
- 31 土地的公有与私有 103
- 32 土地私有与兼并 105
- 33 土地私有制及其买卖的形成 108
- 34 影响土地分配的因素 112
- 35 节制兼并的思想与措施 116
- 36 北魏首创的均田制 121
- 37 小农民经济与地主经济 126
- 38 土地租佃制 129
- 39 一个经济规律：私有制必然导致土地兼并 133
- 40 手工业的发展 135
- 41 丝织业的起源 137
- 42 丝织业的发展 140
- 43 明清时代丝织业发展的原因 144
- 44 机户——家杼轴而户纂组 147
- 45 麻织业的发展 150
- 46 驱——商人与生产者的桥梁 153
- 47 棉纺织业的起源 155
- 48 棉纺织业的发展 159
- 49 中国农村的传统家庭副业 162
- 50 纺织业在都市的出现 165

农作物由野生进到人工培育，尤其谷类作物的开始种植，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古代文明如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美洲，其起源几乎都是建立在农作物由人工栽培的基础上。

照近年在中国南部，特别是长江流域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来看，上述单元论者的说法并不能成立；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长江流域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作物栽培中心。由于中国地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大气候区，各个地区都有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植物群。最晚到新石器时代，或许是同时，或者在相距不远的期间内，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已有人工栽培的农作物出现。照近年地下出土的资料显示，在公元前五千年，长江流域的农业似乎比同时代的北方进步。然而直到汉初，南方的农业仍然停留在较原始的阶段，黄河流域此时却成了农业高度发达地区。

新石器时代作物栽培和农业发展的概况：新石器时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农作物的栽培。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G. Anderson）在河南仰韶村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带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外壳。晚近30年来，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陆续发现了更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的遗址不仅有农作物，甚至有农具的出现。今就黄河和长江流域，有谷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列表如下





(此两地区以外者, 均未列入):

遗址名称	文化期	植物名称	碳十四年代 (B. G) (树轮校正)	资料来源
河北邯郸磁山	磁 山	腐烂的 谷物 (粟)	5 885 ± 150	[考古] 1977. 6, 1979. 1, P. 45 1974. 4, P. 336
陕西西安半坡	仰 韶	粟 (Setaria Italica), 白菜 或芥菜	4 770 ± 135 4 290 ± 200	[西安半坡] P. 223 - 224
陕西华县 柳子镇	仰 韶	粟		[考古] 1959. 2, P. 73
陕西华县 柳泉护村	仰 韶	粟		[新中国的考 古收获] P. 11
山西泉荆村	仰 韶	粟		[考古] 1959. 2, P. 73
青海乐都柳湾	马 厂	粟	* 2 280 ± 140 2 145 ± 120	[考古] 1976. 6, P. 366 [考古] 1960. 3, P. 10
湖北武昌洪门	屈家岭	梗稻		
放鹰台				
湖北江陵 毛家山	大溪文化	稻壳		[考古] 1977. 3, P. 159
四川巫山大溪		稻壳	仰韶后期	[考古] 1979. 3, 163 - 164

* 表中碳 14 年代载于 [考古] 1977. 4 附表。

上表中, 发现有栽培作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黄河流域有九处, 长江流域有 14 处。此虽不足以表示长江流域的农业, 比黄河流域更普遍, 或更发达, 但从出土的个别作物可以看出,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农业中心。前者以栽培旱地作物的粟为主; 后者则以水稻为主。

由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不同, 植物种类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植物学者李惠林根据气候、地理以及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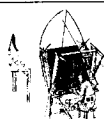
物之不同，认为中国农业并非起源于一个地区。李氏主张北方以抗旱、耐冷的粟、黍为主，另配合其他干果作物如柿、栗、枣等，构成了一个复合的旱地作物农业系统；南方则以水稻为主，结合其他水生作物如菱、藕、菰（*Seen-Zi Zania*）等，而成为一个复合的水生作物农业系统。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谷物，以河北磁山为最早，浙江河姆渡次之，西安半坡又次之。河南新郑裴李岗的遗址，曾出土农具，但未发现谷物的遗迹，其年代则较磁山尤早，根据树轮校正，时当公元前6280年及其前后500年左右。以现有资料综而论之，长江流域农业的出现，比黄河流域仅晚了千年左右。不过从河姆渡出土遗物的内涵来看，它是一个相当进步的农业文化遗址。河姆渡第四层遗址，曾发现木构的住屋，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有长期耕作的定居生活，而且稻米已成为主要的食物。据此判断，在产生河姆渡农业文化以前，南方地区的农业，必已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化过程。

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地出土的石器中，都已有磨制相当精细的农具，如石铲、犁形器、石刀、石镰等。在浙江吴与钱山漾遗址中，还曾出现过三角形石犁与耘田器，此在黄河流域尚未发现过；耘田器本身，说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已开始有中耕除草的技术。黄河流域是否如此，则尚未可知。此外，磁山、西安半坡、河姆渡皆曾出土骨铲，其中河姆渡出土者，制作最为精致，体形厚大。有一件长28.5厘米，刃宽17.5厘米，此在黄河流域也尚未发现。在出土的农作物方面，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仅发现有粟、稻和一种蔬菜；长江流域则有水稻（秈稻和粳稻）、蚕豆、芝麻、花生、瓜、葫芦等。

综上所述，大体可见在新石器时代，我国黄河和长江流

域在相距不远的期间，先后都展开了农作物的栽培工作，并且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的程度较之黄河流域，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由作物种类的多寡看来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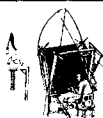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是在黄河流域历经战国到汉代所完成的。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不断的输入南方，使当地日臻开发。唐朝时，长江流域不但摆脱了落后的局面，进而凌驾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当时珠江流域的农业则十分落后，进一步获得开发，要到宋代以后。

关于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情形，在汉代以前，除了知道金属农具已经开始使用外，其他方面从文献上所见甚少。在中国自商代已有少量的青铜农具开始使用。山西和江苏六合（长江北岸）也曾出土过春秋时代的青铜农具。据“考工记”的记载，吴越地区使用青铜农具的情形，似乎要比黄河流域来得普遍。〔周礼〕上就曾说：“粤之无铸，非无铸也。夫人而能为铸也。”郑玄注：“粤地涂泥，多草岁，而山生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

今就出土的资料综而论之，春秋末期楚人发明了生铁冶炼的技术，并用以制造农具。当铸铁技术传入北方后，铁制农具的使用，很迅速的传播开来。等到战国中期时，铁制农具在黄河流域农业核心地区使用情形反较长江流域为普遍；而淮水流域有些地区，竟然到了东汉时代，还不知道使用金属制农具和牛耕技术（见〔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景传〕）。



单从金属农具的使用情形，很难看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春秋时代，双方农业发展程度的高下。不过，从出土农具和文献记载看来，可以确信的是在战国时代，黄河流域的确已成为农业高度发展地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假设由于黄河流域铁农具的使用，使南北双方农业发展程度，起了很大的差距，那么，前述楚人首先发明了铁制农具，何以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竟不能胜过北方呢？因此，长江流域农业发展迟缓的原因，似乎不能单从铁制农具的使用与否来解释，真正原因或许是自然环境使然。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明确指出自然环境与人文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地理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可以从如下几点具体看出来：（1）南方湿热多疾病，影响人口的增加；（2）温暖的气候使南方天然食物丰富，以致养成土著怠惰不事储蓄的习性；（3）北方人口众多，且受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因此养成居民勤于农作、节俭的习性。

〔史记〕中曾明言：“鲁……地小人众，俭啬，……夫自鸿沟以东，……好稼穡，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买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饿之患，以故苟且偷生。”（〔史记〕“货殖列传”）

此外，班固在〔汉书〕中也提到：“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阂”（〔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在同书中，班固还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紧水土之风气……”（〔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这大致上可以代表汉代一般人，对于自然环境影响人文关系的基本认识。

关于中国的气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胡厚宣根据甲骨文资料，主张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同

